

【历史研究】

困在学术与皇权间的东汉大儒

曹瑞涛

(杭州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中的许多人往往具有官员和学者两重身份,然而其学术与皇权的关系却并不总是和谐,当皇权与学术发生冲突时,尤其在强而有力的君主面前,作为学者的官员多会委曲自己的学术观点。以东汉帝国的缔造者光武帝为例,其为人处事素有谨慎、宽厚之声誉,但因对谶纬之学格外喜好,从而与当时大儒观念不合。通过考查郑兴、桓谭和贾逵三位学者在那种权力氛围内的学术取舍,可窥见古典帝制时代皇权与学术关系之一斑。

【关键词】谶纬之学; 光武帝; 郑兴; 桓谭; 贾逵

【中图分类号】K2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19)05-0059-04

一、“仕—学”之间

传统士大夫阶层中的许多人往往同时拥有两种身份:学者,官僚。对于这些戴着官帽的学者,日本学者佐藤慎一研究清中后期官员情况时曾不无感慨地指出:“他们的学问水准远远地超出了单纯的教养领域。例如著作《十七史商榷》百卷,在史学界留下了巨大足迹的王鸣盛(1722—1797),是官至内阁学士的大官僚;刊行《经籍纂诂》和《皇清经解》而对经学作出贡献的阮元(1764—1894),也历任湖广总督和两广总督的大官僚。就算他们事例著名,也决不是例外的事例。这样具有很高学术水准的官僚层的持续存在,以历史的眼光看,即使在19世纪后半期这一历史时期,除了中国之外,也仅仅只有朝鲜可以相提并论。”^[1]

官僚队伍的学者化不唯清季如此,历朝历代大多一样,甚至天下大乱之际,学问不退反进,叱咤风云的政坛人物中竟能涌现出不少学问大家,这与将近路易十三时代的欧洲宫廷里掌权的贵族老爷们大多还是些文盲相比,简直是霄壤之别。当然,做官并非需要大学问才行,否则文盲治下的欧洲早就集体破产,或被有学问的教士阶层篡了权才合理,只能说在中华帝国的文化背景下,学者被特别鼓励出来当官,官员则又格外以当学者为荣。子夏就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第十

九》)朱子将“优”解释为“有余力也”。^[2]学有余力,就该出来当官为社会做贡献;当官有余暇,不要吃喝玩乐,而是闭门读读书。

然而,“仕”与“学”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如果进入权力体系,士大夫们必然被嵌入上命下效的服从关系链内,时刻保持着对于权力的畏惧;若多出一层学者身份,不免又对学问生出尊重。虽然儒家的学问总在协助权力,但也有学问和权力相冲突的时候,如果学问让权力——尤其是高效运转的皇权——感到了威胁,便是亚圣的书,洪武皇帝也是说删就删;另一方面,当统治者认为学问不再令其不安、不快,也能给予学问充分的尊重,甚至灭了方孝儒十族的明成祖朱棣位子坐稳后,在编纂《永乐大典》时就“对于所收入的书籍不许任意删节、涂改。只许一字不差照原书分别编进去”^[3]。所以,“仕”与“学”间的关系颇为微妙、复杂,这使得学者型官员在身份切换时经常会遇到莫名其妙的境遇,行走其间可谓步步惊心。那么,幸遇明君,情况是否会好一些呢?

史家评价东汉王朝的缔造者光武帝刘秀时说:“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资治通鉴》卷四十四,光武帝中元二年)国家初定,刘秀就能使文官政体得以及时重建、政府运转走上正轨,这与他能以温和大度的姿

【收稿日期】2019-03-02

【作者简介】曹瑞涛(1973—),男,山西太原人,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哲学、汉唐文史问题研究。

态笼络住大批儒家知识分子是分不开的。便是戎马征伐之际,马援向陇右割据集团总头目隗嚣汇报对于刘秀印象时,说他“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不仅如此,还“动如节度,又不喜饮酒”。(《资治通鉴》卷四十一,光武帝建武四年)

这样一位极具现实感又谨慎、宽厚、儒雅的帝王,应当会让朝堂上的文人学士在“仕”与“学”间不致太过为难吧?可惜,人无完人,光武帝刘秀居然喜好谶纬之学!

二、光武帝好谶纬之学

谶是秦汉时巫师、术士间传播的各种天启和预言,当时儒生中不少人热衷用这种神秘的方术来附会儒家经典,从而形成纬书,虽说谶纬之学在两汉都属显学,但不少学识渊博的大儒却对它嗤之以鼻,这是谶纬之学与原儒精神根本上相异的结果。

在现代科学史家看来,“巫术要假定自然界中是有规则的,人通过适当的行为就可以利用这些规则去控制自然界”。^[4]故而巫术与现代科技间有着相近的精神内涵,可作为神秘巫术体系的谶纬之学虽然也包含有科学萌芽,但却没将关注点停留在自然界,它严重偏斜于社会政治领域。王莽篡位时,格外倚重“符命”来造声势,以致“吏民争为符命,皆得封侯”,不愿趋炎附势者见面则相戏道:“独无天帝除书乎?”(《资治通鉴》卷三十七,王莽始建国二年)这样一来,谶纬之学中那点儿科学精神没开发出来,反而在政治领域里被玩得声名狼藉。

早在春秋之末,列国纷争日渐惨烈,务实的政治家已不太迷信,郑国的子产就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兵家更是声称:“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也。”(《孙子·用间篇》)一片实事求是的大氛围下,原儒们同样不喜虚招,孔子不但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而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与这种原儒精神相对,西汉承平日久,清闲太多则现实感不足,神神鬼鬼的玩意儿成了时髦,可这些毕竟与原儒精神不合,冷静且明智的儒家学者便不怎么待见谶纬之学。

既然谶纬之学不合原儒精神又声名不好,为何会受到刘秀的格外青睐呢?或许恰是在刘秀当皇帝这件事上,谶语应验了!刘秀未起兵前,颇学图谶的蔡少公就预言:“‘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公刘秀乎?’秀戏曰:‘何用知非仆邪!’坐者皆大笑。”(《资治通鉴》卷三十八,王莽地皇三年)国师公刘秀

就是西汉末年的大儒刘歆,他在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改名为“秀”,应当是避哀帝刘欣之讳,时人一提起“刘秀”,想到的首先是国师公刘秀,不过草莽中的刘秀未必这么想。

到了更始元年(公元23年),又有位叫西门君惠的术士对卫将军王涉曰:“谶文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姓名是也。”(《资治通鉴》卷三十九,淮阳王更始元年)于是撺掇着国师公造反,国师公自然知晓当时流行的这类谶语,不免心动,可惜书生心毒手拙,还没举事就被王莽发觉了,吓得自杀了断。当时的光武帝人微名薄,还没能力造假,这些事多少有些事实成份,也正因如此,刘秀愈接近权力巅峰,便越相信上承天命,谶语不虚。

待到刘秀与更始皇帝刘玄反目,随着战场上日渐得手,麾下将领们开始轮番劝进,刘秀素来谨慎,一再推脱,等着封侯的将领们急不可耐。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儒生彊华专程从关中赶来奉献《赤伏符》,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门外,四七之际火为主。”符中“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际也。汉火德,故火为主也。”(《资治通鉴》卷三十二,光武帝建武元年)有了这道符,刘秀才觉得踏实,设坛祭天,在鄯县(今河北柏乡北)登基称帝。

得了如此多甜头,刘秀无论是真信还是利用,总之甚好谶纬之学,这无疑给当朝大儒们带来了莫大困扰。这种困扰在殷商时代或许不会存在,殷人笃信鬼神,凡事卜一下才敢做,那时的知识阶层乃巫祝之属,他们处于统治集团核心,与权力一体不二,巫祝所掌握、研讨的知识就是权力的原则。到了春秋之末,形势大变,周室衰微,知识官吏纷纷失职,只能以各自掌握的知识投靠于诸侯之所,司徒出身的儒家首先在民间招徒授业,“百家”的出现,其一个“家”字,“就暗示着与个人或私人有关的意思。”^[5]之后,作为相对独立思想家的儒者虽再次入仕,但原本一体的“仕”与“学”实际上已经分开了。

在这种情况下,顶着官帽效命皇家的几位东汉朝堂里学贯古今的大儒便无可避免地被推到风口浪尖上。

三、东汉初年大儒的危境

武帝独尊儒术后,上命下效的权力体系里填充进的多是儒生,可与权力看似颇亲近的儒家终归没成为殷商时的巫祝,毕竟“仕”“学”分离后,儒家已生出作为独立之“家”的新“特性”。孔子曾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顺则臣有顺命,君命逆则臣有逆命。”(《礼记·表记》)孔子所谓的

“天”已非殷商时鬼神之天，而是抽象的道德之天，统治者须以德配天，士才会顺之，否则虽君命亦逆之。

进而，儒者自我规范的理想亦标到极高冷之境，所谓“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礼记·儒行》）这样一来，众儒虽然再次参与到权力体系内，但其上承的天道之“学”就可能对其现实中的“仕”进行居高临下的评判，落实在关于谶纬之学的态度上，便不可避免地会有些“榆木脑袋”与嗜好谶纬之学的皇家屡起冲突。

首先起冲突的一位，是“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的郑兴。东汉之际，对《左传》的研究，除了传其父业的贾逵自成一派外，“世言《左氏》者多祖于兴……故有郑、贾之学。”郑兴并非绝口不言神异之事，他与董仲舒颇类似，喜以天人感应的招数敲打帝王，建武七年（公元31年）三月发生日食，官拜太中大夫的郑兴就上疏曰：“《春秋》以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人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所以，“夫国无善政，则谪见日月，变咎之来，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择人处位也。”郑兴大谈玄而又玄的天人感应之说，仿佛对了刘秀的胃口，提的意见多有所纳，到了准备郊祀之事时，还专门请教郑兴：“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其实，光武帝迷信的那个鬼神之天和郑兴所指的道德之天根本不是一码事，郑兴立刻答道：“臣不为谶。”高高在上的帝王立刻觉得自己受了骗，“怒曰：‘卿之不为谶，非之邪？’”逆了龙鳞，“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之后，虽然“兴数言政事，依经守义，文章温雅，然以不善谶故不能任。”郑兴也颇有些古风，三谏不从，也就自行撤了，“后遂不复仕，客授闾乡，三公连辟不肯应，卒于家。”（《后汉书·郑兴传》）

另一位起冲突的则惨烈许多，此公姓桓名谭字君山，“博学多通，徧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桓谭为人或有些“狂”，总是“简易不修威仪，而意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王莽当政时，“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作符命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到了光武朝，桓谭官当到议郎给事中，他与郑兴不同，郑兴是不小心逆了龙鳞，他是专门去逆龙鳞！他上疏直言：“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光武帝终归很有涵养，看过奏章尽管十分不快，却也将气憋下了。后来，在讨论择地建灵台之事的御前会

议上时，刘秀故意向桓谭发问：“吾欲以谶决之，何如？”桓谭沉默良久，对曰：“臣不读谶。”刘秀问其故，桓谭没像郑兴那般赶快找个台阶下，只管说谶纬之学太高深，唯有如您般伟大的帝王才配知晓，臣才疏学浅……而是“极言谶之非经。”这下终于把刘秀憋的一肚子气给引炸了，“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刘秀虽然宽恕了桓谭，却也嫌这不识时务的家伙碍眼，便把他贬为六安郡丞，桓谭“竟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后汉书·桓谭传》）

吕思勉先生评刘秀时说：“光武帝虽然厚貌深文，其实行督责之术，是很严紧的。”^[6]两位大儒的前鉴明摆在朝堂，满朝文武也就都晓得了新皇帝不好惹。对“入仕”的儒生来说，得好好当差做事，马虎不得；可对于认真“为学”的官员来说，难免在“道”和“权”上伤神。于这种氛围中，晚到登场的贾逵之表现便更有代表性了。

四、贾逵的妥协与苦衷

贾逵的九世祖是大名鼎鼎的贾谊，其父贾徽师从刘歆学习《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从涂恽那里学习《古文尚书》，从谢曼卿处学习《毛诗》，著有《左氏条例》二十一篇。家学有渊源，书香熏陶中成长起来的贾逵学术贡献很大，“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万言，又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凡九篇，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杜林从西州（新疆）得到的漆书《古文尚书》一卷，经贾逵、马融、郑玄作注才显于世，而《古文尚书》晋升为“经”，则是贾逵努力的结果。（《后汉书·贾逵传》）

西汉时今古文争得很厉害，虽说两派打出来的“道”其实也是幌子，骨子里所争的还在禄位与声势，但两派里毕竟有正经学者，除现实名利之争外，学风上确有不同。“大致今文派继承先秦诸子的风气，‘思以其道易天下’，所以主张通经致用。他们解经，只重微言大义；……古文派不重哲学而重历史，他们要负起保存和会面文献的责任；所留心的是在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之间。”^{[7]20-21}贾逵作为古文派经师，秉承“微实”的学风，对谶纬之学中虚妄不经的附会不以为然，可学风碰到权力，便不得不为然起来了。

当年，刘歆为论证王莽篡位乃上承天意之举，专门另创出一套五德终始说，以伏羲的木德为始，用五行相生代替相克之说，汉为火德，尧亦为火德，王莽则是“以土德王”的黄帝和舜之后，这样“火生土”对应着尧禅让于舜，也对应着火德的汉禅位于土德的新。然而，以前史说中黄帝到尧中间只有颛

项和帝尝两代,尧就只能为木。于是,“他们毅然决然,在黄帝、颛顼之间插下一个少皞,使他居于金德的地位,于是王莽的戏法就变成功了!”^[8]

王莽垮台后戏法却没穿帮,因为刘秀是借《赤伏符》登的基,所以东汉仍为火德,又自以为尧之后,所以尧就必须也为火德,谎还得接着圆下去,如何才能坐实王莽和刘歆编造出来的少皞呢?这个学术难题难不倒通儒贾逵,章帝刘炟时,官拜为郎的贾逵从《左传》里找到了证据,他在向皇帝的奏书中汇报说:“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讖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讖所谓帝宣也。”皇家一听,非常高兴,“赐布五百匹,衣一袭,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后汉书·贾逵传》)

“晋范宁作《穀梁传序》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艳’是文章美,‘富’是材料多,‘巫’是多叙鬼神,预言祸福。”所以《左传》中夹杂的“迷信卜筮,所记福祸的预言,几乎无不应验;这却是大大违背了徵实的精神,而和儒家宗旨也不合了。”^{[7]45}这个道理并非只有晋人明白,古文经学学者心里也是清楚的,作为大学问家的贾逵为后世学者诟病之处,就在于他虽在解诂经典时力斥讖纬之学,却在现实中又以讖纬之术讨好皇家。

当然,贾逵这样做,背后自有苦衷。贾逵生于建武六年(公元30年),基本是在稳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纯粹东汉人,相比于历经了西汉、新朝、更始后入光武朝的桓谭,和还能在陇右隗嚣和光武间周旋选择的郑兴等前辈大儒,大一统带来和平之时,也将纯粹东汉学者型官员置于无地遁逃的处境。尤其贾逵,“自为儿童,常在太学,不通人间事。”章帝时,贾逵母亲生病,刘炟让颍阳侯马防带二十万钱去慰问,特别叮嘱道:“此子无人事于外,屡空则从孤竹之子于首阳山矣。”(《后汉书·贾逵传》)

作为一介书生的贾逵,生于中兴之世、长于名师门下,专心读书,不善社会交际,官位、名衔、乃至一切生计都依赖于帝王的恩惠,若失了皇家支持,真就会如伯夷、叔齐一般饿死首阳山上。况且,东汉庄帝、章帝都承了光武兼用王霸、督责甚严的风格,贾逵又怎么敢顶着盛名却不与皇家合作呢?

五、尾 声

光武帝用军事手段剪灭各路割据势力,但马上得来的天下毕竟不能在马上治之,兴复汉室还得靠谨修内政、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因而,登基之始光武帝便摆出一幅尊儒雅、好经术的姿态,建武五年

(公元29年)起大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又建三雍,引得四方学士抱负坟策,云集京师,一时间颇有些文教昌盛的气象。然而,如吕思勉先生所云:光武帝偃武修文毕竟出自“定乱后之亟务”的政治考量,“所谓右文者,仍不免徒饰观听,与先汉武帝同病也。”进而,“光武亦非知礼乐之人,其勤于建立,或转以承新室之后,闻见所习耳。”^[9]既为闻见所习之转承,根本上便无多少鉴别能力,新室中讖纬的那一套就接了过来,加之光武本人也好这一口,自然又成了显学。

如此形势,对于皇家所倡之学颇不以为然的朝中大儒而言,处境自然不妙起来,尤其伴随着敌国外患逐一灭亡,君王渐渐没了委曲身段表演宽宏大量的心情!于是乎,何去何从的抉择无可回避地摊在每一位心怀异志的书生加官员的面前,进而派生出以郑兴、桓谭和贾逵这三位居官大儒为代表的三条道路,想必大多数人最终还是步了贾逵的后尘,按照“中庸”或者更恰当一点说是“和稀泥”的方式,既给天子,也给自己一个蒙混过关的交待吧。当然,蒙混只是一时,谁也堵不住后人的嘴,对于这三位大儒还有他们的顶头上司:光武帝。范曄评论道:“桓谭以不善讖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傅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哉!”(《资治通鉴》卷四十四,光武帝中元元年)不过,范曄所谓的悲,不知是桓谭、郑兴之悲,还是贾逵之悲,抑或是世主之悲?或许不仅仅是历史中具体哪个个人的悲哀,而是困在皇权怪圈中的“学”之悲哀吧。

[参 考 文 献]

- [1] 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2.
- [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190.
- [3] 顾颉刚.中国史学入门[M].何启君整理.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163.
- [4] 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28.
- [5]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2.
- [6] 吕思勉.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5:76.
- [7] 朱自清.经典常谈[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8]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48.
- [9] 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29.

(责任编辑:闫卫平)

(下转第70页)